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历经75年,出到3000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这块文艺园地经历了“冰雹、雷电”,但是,云销雨霁,“文艺周刊”还是以它特有的“淡淡妆,天然样”,走到读者的面前。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来临之际,想起父母早年编辑“文艺周刊”的情况,使得我们有了一个集中回忆父母的记忆。这些天,我们一直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恍惚间,父母又来到我们身边,他们还都年轻,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时的样子。

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不做声……

父亲,邹明;母亲,李牧歌。他们青年时都爱好文艺。1948年,他们在冀东负责《后勤报》的编辑工作,1949年初,天津解放,他们同时进城,分配到《天津日报》副刊科工作。郭小川、方纪和孙犁是“文艺周刊”的创始人。没过多久,郭小川、方纪都因工作需要而调离,孙犁随后升任编委,仍审阅“文艺周刊”稿件,父亲则具体负责“文艺周刊”的日常编辑,为作者写了多少编辑点评。

在孙犁的领导下,“文艺周刊”很快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组织了一支颇具规模的作者队伍,发表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在国内独树一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副刊编辑工作的严肃与认真,得到了孙犁的充分信赖和广大读者的喜爱。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尚年幼,只记得父母经常加班。他们匆匆吃过晚饭,给保姆摆下一句话“让他们早点睡觉吧”,就去报社工作了,往往是我们已经入睡,他们才回来。一次,我听到父亲上楼时“噤噤”的脚步声,我赶紧装睡。他一走进,就向保姆姚大姨:“今天,小彤的咳嗽好些了吗?”保姆马上回答:“好了,明天送她去幼儿园吧。”话音刚落,我突然嗓子发痒,咳嗽起来。父亲见状说:“明天不要去幼儿园了。”他走后,保姆对此大为不满,说我“就会装事儿”。我感到很委屈。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得的是百日咳,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她为当时没有很好地照顾我,而感到歉疚。那时的家长,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父母在家里经常为什么事儿发生争执,中间总是会提到“孙犁同志”。于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工作上的事儿争吵,而且,孙犁很重要。

1959年,父亲受“反右倾”的牵连,调离了报社。1980年,孙犁向报社总编辑石坚建议,将父亲调回天津日报社,主编《文艺》(双月刊)。父亲终于又回到阔别二十年之久的报社编辑部。弟弟在谈到父亲的工作时说:“爸编辑这个刊物,也不容易。《文艺》(双月刊)虽然是在报社印刷,实际已经走向市场,得有人买、有人订,达到一定的份数才能保底。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期刊蜂拥而起,大型的有《收获》《十月》等,《文艺》(双月刊)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谈何容易。一些知名作家都愿意把稿件投到影响力更大的刊物。”

1982年初春,父亲来北京组稿。粉碎“四人帮”后,家里发生很大变化。我考上北京的一所学校,弟弟从吉林调回天津。特别是父母,又回到他们熟悉的工作岗位,父亲的心情尤其舒畅。他先去看望了刘绍棠、从维熙等老朋友。他们之间有长谈、有畅饮,洋溢着劫后重生的喜悦,同时也有稿件的落实。

父亲在离开北京前一天的下午,去一位名家里约稿,我陪同。父亲彬彬有礼地做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我们正在搞一期京津新老作者的特刊,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您是前辈,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只见对方皱着眉头,一脸的不耐烦,不等父亲把话说完,她就火了:“你们地方刊物,为什么不跑到北京来约稿,各地的编辑都来找我,我还做不做自己的工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她说个不停,父亲根本插不上话。一走出她家,我愤愤不平。父亲只是平静地说:“人家是老作家,老革命……”这个情景我一直都记着。第一次发现了父亲忍耐和宽厚的一面,同时也体会到,做编辑工作也有很多尴尬、为难之处。

母亲也常来京组稿,我陪她到过陈荒煤、冰心,还有从维熙的家,几位作家待人亲切、尊重,没有一点架子。在从维熙家,他还热情地留我们吃饭,讲到他母亲的时,富有感情。家父去世时,从维熙还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父母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前后两个时期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不计名利。宋曙光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我母亲不辞辛苦地带着他到北京组稿,还在1986年春天,随同我父亲远赴湖北武汉,拜访老作家。父母不顾年事已高,体力有限,尽了自己的园丁之责。

父亲清瘦、儒雅。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婆婆陈柏生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就说:“邹明长得像老邹,他也是福建人。”婆婆曾在邓拓手下工作多年。对此,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对一般人来说,长得像谁没有多少意义。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的一天,我随意翻看家里的老书柜,见到一本《人民新闻家邓拓》。书是1991年出版的,收集了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回忆。尽管书的纸灰、字小、行密,我还是拿出来,掸掉灰尘,读了起来。其中有石坚的一篇文章,他记述了1958年,在津接待邓拓的情景。邓拓来参观,他要去火车站接人,但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面。石坚写道:“市委书记王亢之同志告诉我邓拓的特征:身体瘦弱,文质彬彬,就像天津日报社一位编辑邹明那样。”石坚按照这个特征,顺利接到了邓拓。

父亲与孙犁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亲近的朋友。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友谊得到考验。父亲对孙犁始终很尊重,佩服他的学识、文笔,敬重他的为人。而孙犁对父亲则是信任的人为正直和编辑水平,在《记邹明》一文中,字里行间充满他对父亲的理解和感情。

1984年,我到南方出差,在雨花台,精心挑选了一些雨花石。它们红白相间,纹理细腻,在清水浸泡和阳光的辉映下,显得精神抖擞,灵动可爱。父亲看到带回的雨花石和苏州的精巧甜点,为了让孙犁在孤独的生活中高兴一下,他带着雨花石和甜点送给孙犁,他说:“孙犁肠胃不好,不能多吃。”

我家离孙犁家很近,父亲经常到他家里小坐。每次回来,他脸上都挂着欣喜。一天,他回来后显得格外高兴。在孙犁家,他又读到了孙犁的新作,我好奇地问:“怎么样?”父亲非常佩服地说:“那还用说,孙犁就是孙犁,一出口就是作家的语言。”

父亲为人质朴,很重友情。1989年夏,父亲已经感到身体不适,正赶上曾任文艺组负责人的荣荣去世,他坚持抱病参加告别仪式。那天,下着小雨,父亲一早就做好了出门准备,穿着整齐,他要去看老朋友最后一面。不知何故,报社的车队突然说不能派车了,父亲很是遗憾。没过多久,8月初,他又带病赶往北京,参加舒群、张道藩的追悼会。那竟是父亲最后一次外出。

在我们几个姐弟中,丹丹与孙犁最亲近。在她纯朴的感情里,孙犁永远是和蔼可亲、正直高尚的人。2021年,她在回忆时说:上世纪50年代初,孙犁伯伯与我们住一个大院,我家住楼上,他家住楼下。我每天到院子里去玩儿,路过他家,我都看看他,他也总是亲切地跟我说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其实,那时他只有40岁出头儿。后来,他搬家到多伦道,见面的机会少了。

1974年夏天,我从西北兵团回家探亲。一天傍晚,我和姐姐丹丹一起去看望孙犁。他坐在阳台的一张藤椅上,女儿晓玲在他身边,他见到我们很高兴。他对我说:“你的照片,摆在兄弟照相馆的橱窗里,我看到了,摆得很好。”

1992年,我和母亲一起去看望孙犁。当时,他看上去显得有些消瘦,穿着一件银灰色条绒夹克,还是很有风度,举止潇洒,声音洪亮,笑声朗朗,说话从不重复。

2000年,听说孙犁已经住院两年了。一天,我到总医院去看望他。孙犁躺在病床上,晓玲守候在旁。他静静地躺着,比以前消瘦了很多。晓玲低声告诉我:“他知道你来了。”我看到昔日那么高大、谈笑风生、富有神采的孙犁伯伯,现在躺在一张病床上,那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我顿时感到无比凄怆,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我走上前去,双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传递着我多少年来,对孙犁伯伯的崇敬和亲近的感情。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默默地在与孙犁伯伯告别。

除了中间十多年的停顿,母亲先后编辑“文艺周刊”长达26年。1979年,她重新回到报社。石坚总编辑找她谈话,希望她能到文艺组的工作全面负责起来,但母亲考虑到身体状况和年龄,还是愿意把精力完全放在“文艺周刊”上。这确实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每周出一期,要从众多的稿件中选出好稿并加以修改,一环扣一环,如果终审时稿件不通过,一切需推倒重来。直到晚年,有一天夜里,母亲还梦见分管“文艺周刊”的编委肖元找她,说哪篇文章有问题,她一下子就惊醒了。

弟弟回忆说:“妈看稿比较慢,但很仔细。她审阅作者的稿件就是一遍,有什么差错就都改好了。有一次,在报社食堂的饭桌上,妈和我,还有文艺部副主任亚方。她们谈的还是工作,关于正在修改并准备发表的一篇稿件,妈说:‘前边写了六亿神州,后边又写七亿……这个应该统一。’亚方笑了笑,也没说什么。这件事,至少过去五六十年了,我还有印象。”

弟弟还说:“家里原来有一本纪念王亢之的文集,厚厚一大本,很多人都写了文章。其中有李夫同志的一篇:‘有一次,王亢之要下乡调查,让报社派一名女记者(可能与妇女问题有关)。报社女同志中,就是周沱和李牧歌比较能写,最后还是周沱去了。’当时的报社人才济济,可见咱妈是较为突出的。后来,我读孙犁的《书衣文录》,写在1975年,周沱去世时,孙犁用了‘才女薄命’一词,也是叹为可惜。”

母亲在“文艺周刊”发表过对新人新作的推荐和评论,也写过两篇以我们为原型的儿童作品。她对我说,曾有一位《儿童文学》的编辑,读了她的文章,还特意跑来向她约稿。然而,在她负责“文艺周刊”期间,个人作品发表极少,她坚持将有限的版面留给投稿作者的原则。

母亲早年很喜欢《简·爱》,她欣赏主人公的独立人格,自强不息。母亲就是从那个轻视女性的封建家庭走出来的,在感情上有共鸣。在母亲晚年,我每次回家,总见她手捧一本《古文观止》。她精神好的时候,向我提议:“咱们一起学习《古文观止》。”

2004年秋天,在我们的鼓励下,母亲又拿起笔来,写了一篇回忆孙犁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一些老友纷纷打来电话,说她写得好。之后,她又写了方纪、舒群和祖母等六篇文章,都发表在“文艺周刊”上。她把散落尘封的回忆,像珍珠一样一颗颗寻找,连缀起来。在写舒群时,她需要一些相关资料,就请曾一起共事的田晓明帮忙,从图书馆查找并复印,母亲对此非常感激。她对“小弟”宋曙光对她的关照和帮助,也是念念不忘。

“文艺周刊”从1000期到今天的3000期,虽已过去了41年,但千期纪念的版面,仍然清晰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那里面凝结着母亲的心血。还记得千期出刊当天,父亲特意到百货大楼,买了一条质地松软,颜色淡雅的拉毛围巾,他说:“你妈妈办这个‘周刊’不容易,值得庆祝一下。”那天,母亲像过节一样高兴……

2024年11月5日

2024年11月5日

2024年11月5日

2024年11月5日

文艺周刊

第三〇〇一期
纪念专版

一张党报的文学副刊,在逾75年的时光里,始终孜孜以求做着同一件事情——以发现和培养业余文学作者为己任,并不遗余力地将优秀作家和优秀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推向文坛、推向时代,这就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在众多业余文学作者的眼中,它是文学的殿堂,更是作家的摇篮。“文艺周刊”创办于1949年3月24日,甚至早于新中国的成立日期。这使得“文艺周刊”不仅全程见证了新中国文学75年的发展历史,还在场的姿态置身其间,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在新中国文学史上不同历史时期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为彰显和繁荣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令人肃然起敬。

我从事文学创作比较早,大约从十四五岁开始尝试文学写作,也是从那时便知道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并把在“文艺周刊”发稿当作自己的目标之一。这不奇怪,在国内文学界,许多人都知道《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曾经给“文艺周刊”写过稿,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孙犁、郭小川、刘绍棠、“荷花淀派”等,而认识、了解到它悠久的历史与传承,因而记住了这份中国文学史而言,必将留下一笔的文学副刊版面。75年来,“文艺周刊”始终是一张有态度、有温度、有高度的文学副刊版面,它像是一座桥梁,一头牵连着文学,一头联系着广大业余文学创作者。作品被“文艺周刊”发表,对于许多文学作者而言,都是一次鼓励,更是一种认可。所以,在它出刊3000期的“大日子”到来之际,我愿意将最美好的祝福词汇送给它。跨越四分之一世纪,奉献给读者和社会3000期文学大餐,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回溯过往,是孙犁、郭小川、方纪等文学家,夯实了“文艺周刊”的根基,这在新中国的报业副刊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孙犁先生,在他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期间,曾经热心帮助、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其中刘

2019年10月,对我而言是一个幸运的时间。这个月发生的两件事情,令我非常高兴。第一件是我的微型小说《锁链》,在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年度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我在镇江领奖的那个下午,循着喜爱的古诗词,从京口到瓜州,经杜十娘沉百宝箱的运河岸,奔赴江月撩人的扬州。一路上,被那些吹过唐诗宋词的暖风拂过脸庞,阳光中有叮叮当当的诗意。此时虽是烟花一生,却有一种足以铭记三生的春风拂面感,而就在这时,第二件高兴事来了——我的微信收到一个添加好友的信息,对方便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责任编辑,向我约稿。由此,我与“文艺周刊”结缘。

天津于我是一个福地。早年刚刚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我当成教科书来读的《小说月报》等刊物,就出自那片文化热土。特别是21世纪初,天津一家报纸的编辑在九江开会,听到文友提起当时活跃在网络上的我的“民间记事”系列随笔,便打听到我的电子邮箱,向我约稿。之后,《天津文学》和《小说月报》也陆续有我的文字入选。这种不认人、不拘一格的选稿态度,深深地感动并影响了我。

在去往扬州的路上,收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约稿信息的那一刻,我对这块副刊的认知还是陌生的。按照我写稿的习惯,要给哪家媒体供稿,必先看看它的版面以及相关的历史资料,以便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于是,到达扬州古城东关城门,下了出租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索关于“文艺周刊”的相关信息。

两个小时,我坐在马可·波罗雕像背后,借着扬州暖暖的夕阳,读起与“文艺周刊”主题词相关的文字信息。不知不觉,竟沉浸于当代中国文学史中,里面的一个关键词,是我这个将文学作为信仰的朝圣者不敢不知道的。那些熟悉的名字,从创办者孙犁开始,到从这片园地上成长起来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到莫言、贾平凹、李贵通……这些名字,哪一个都有传奇,哪一段都是文坛佳话。

我不能将这份名单列全,更无法将这些可写出文艺论文和专著的材料一一列出,那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纸短情长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让我这个文学新人,从内而外每个毛孔都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此时,我才惊奇地发现,这个看似初识的新友,原来是神交已久的故知。在过往的岁月中,它与我已有无数次的交往,并且带给我那么多的欣喜与感动。

文学在我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起到了疗愈伤痛、激励希望的作用,使我从难以自拔的泥沼中抽身,让我在无数个绝望的夜晚,重新燃起希望的勇气。因而在看到人间真实的喜怒哀乐之后,依然热爱生命,勇敢前行。因而,当我看到真正喜爱文学,并将它当成一回事的人们时,总有一种孤单走夜路太久,突然见到同路人的欣喜与激动。在扬州东关城楼下那片金灿灿的秋光之中,我如坐春风,被一份报纸副刊浓浓的文学情怀所感动。

对于报纸副刊,我虽没经历过群星灿烂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纸副刊名家大师的争奇斗艳,也没见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报纸“新闻为攻,副刊为守”的刀光剑影,但亲身体会并参与过上

绍棠等人受孙犁的文风影响最大,出现了后来被评论家认定为“荷花淀派”的作家群。刘绍棠就曾在《我和报刊》一文中写道:“1951年9月,我15岁,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小说《完秋》……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的强烈美感和感受能力,打开了我的美学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使我汲取到丰富的营养,找到适宜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从1951年9月到1957年春,我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十万字以上的作品。上世纪50年代我出

作育英才 桃李满园

狄青



版的四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中篇小说,相当一部分都曾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作家从维熙也说:“上世纪50年代,我和刘绍棠只见过孙犁同志一面,但从我的第一篇小小说一直到出版两个短篇小说集,除一篇小小说外,都是发表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作家韩映山1952年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处女作《鸭子》,之后又在“文艺周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因文风与孙犁相近,与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并称为“荷花淀派四杰”。

当下社会高速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越来越严格的社会化细分。文学正逐渐趋于小众,而且有一部分文学报刊也将自身定位于服务少数所谓“纯文学”受众,而“文艺周刊”则不然,75年来,它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目光投向大众、面向更广泛的普通读者。天津的群众文学创作之兴盛,应该说始终都是与“文艺周刊”的发展相向同步的,几乎每一位有成就的天津作家,都曾或多或少得到过“文艺周刊”的提携与关爱,更不消说广大业余文学作者。比如我曾经比较熟悉的东丽区群众文学创作吧,因其作者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体实力较强,也为该区赢得了“文学大区”的名号,这与“文艺周刊”对东丽区文学作者的关注和培养密

与『文艺周刊』结缘

曾颖



世纪90年代,国内报纸黄金时代的诸多盛况,不仅在市场类报纸竞争最激烈的成都报纸上写稿,从业,也在北、上、广的诸多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甚至开设专栏。其时,报纸受经济形势和民众信息需求增长的大趋势影响,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呈火热的增长趋势,这些增长又带动报业进一步竞争,各家报纸在新闻上拼速度、在信息上拼广度、在副刊上拼深度和高度。副刊由最初的文学领域,逐渐演变成体现一张报纸文化品相、思想境界和审美趣味的标尺,一大批类型各异的副刊名版,在为报纸提供差异化和看点方面,都做出了有声有色的贡献。那是报纸的黄金时代,也是各种副刊的黄金时代。

在扬州东关浏览“文艺周刊”的办刊历史,我的眼前和耳边,如同电影画面一般,飞速闪过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其时,我所供职的那家有56年历史的晚报,已经濒临停刊,我已灵活就业多时。就像这个时代的许多行业那样,时代在抛弃我们的时候,连个招呼也不会打。正因为如此,当马可·波罗雕像巨大阴影如海水般浸过来,夕阳和那些不可挽留的美好一起远离的感觉涌上心头,令人五味杂陈。

当晚,我第一时间打开稿库,努力想找一篇配得上“文艺周刊”这份厚重的稿件。权衡再三,最终选了一篇从来没有想过要投给报纸副刊的小说稿,因为无论篇幅,还是文本,都与我头脑中早已形成定式的报刊文字不搭界——字数三千字左右,纯小说的写法,远远超出了印象中“1200字且要去掉杂枝杂叶只捞干货”的报刊文字的境界。但基于对“文艺周刊”过往历史以及优秀文章

的阅读,我按下了发送键,由此开启此后几年在该刊上发出多篇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的序幕。这些我自己写得挺高兴,但一直苦于没有地方发表的文学作品,经“文艺周刊”发表后,被《读者》等杂志转载,并成为一些试卷上的阅读题文章,令我倍感欣喜和荣耀。这个阵地,缓解了我对纯文学的很大一部分担心和焦虑。

如今,“文艺周刊”已经走过75年,迎来3000期,这是一件多么值得祝贺,同时也令人百感交集的事。按常情,祝福与嘉许的话肯定是说说的,那并不是空套。作为一个亲身写过报、副刊、文学、种种过往的后来者,在感念前人创下的辉煌业绩,感激先辈们付出的辛劳的同时,也感慨即将到来的未来——我们所热爱的一切,在时代大潮到来时,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以图像代替文字的传播方式,正在滚滚袭来。纸面阅读正在被读屏所取代;碎片化的知识传播,使人们对三分钟以上的叙述都失去了倾听的耐心;算法正在揣摩我们的喜好,将我们送进自以为是的茧房;越来越方便的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从各个领域里挤出,而更加疯狂的脑机接口、万物互联,更是将彻底改变各个领域获取信息和世界运作的规则。碳基文明正在面临硅基文明的冲击甚至取代,而作为碳基文明时代的创造和享用者的我们,与碳基时代的文明产物如报纸、电视以及由此传播的文化与艺术,将面临什么样一种命运,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送去的不仅仅是祝福,也有基于热爱的一种担忧——在这个时代,坚持书写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在越来越易得文字面前,写作者思考和记录时代的意义和方法在哪里?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写作者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摆在包括“文艺周刊”在内的众多文化及艺术类平台要面临的问题。

展望未来,我仍日充满期待。我希望陪伴“文艺周刊”继续前行,创作出更多真诚而有温度的作品。我相信,在编者、作者和读者共同努力下,“文艺周刊”会越办越好,成为读者心中难得的精神家园。即使在遥远而未知的未来,也希望承载着数代文学人美好理想的“文艺周刊”,能伴随着那些梦想,永留于网络、星空与宇宙之间。让我们彼此共勉!

不可分。东丽区的文学骨干者们,都曾经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作品,谁在“文艺周刊”上稿,在该区都曾被视为一件大事。这自然与“文艺周刊”历代编辑背后的默默奉献、辛苦耕耘分不开,尤其是宋曙光先生,我不止一次见到他骑着自行车,从市区到东丽区与作者面对面地沟通稿件的修改,也知道他利用自己的休息地,来东丽区给文学作者特别是农村作者授课,这使他与东丽区文学作者结下了深厚友谊。我的小说就曾发表在“文艺周刊”东丽区文学作品专版上,小说的名字叫《乡里乡亲》,后来有幸被收入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70年精品选》一书中。

在天津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文艺周刊”都不曾缺席,对于津味小说与津派文学,“文艺周刊”起到的不仅是弘扬与助推作用,说旗帜鲜明、举足轻重并不为过。“文艺周刊”先后组织过“津味小说联展”“津味小说抽奖”“津味小说甲午年赛”“津味小说丁酉年赛”等等。事实上,津味小说也好,津派文学也罢,并不只是在作品里出现几句天津话,或是找几个与天津相关联的地标与事件掺杂其间那么简单,也不是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津味小说就是写从前那些“天津老事儿”,至少是写改革开放之前的天津。小说能否真正反映天津的精神风貌,能否将当下现代化大都市背景下的天津人的喜怒哀乐倾注于笔端,才是津味小说与津派文学应该突破的方向。

在这一点上,“文艺周刊”是清醒的,我曾参与过某某“津味小说联展”,写的小说反映的就是当下天津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在与宋曙光先生的沟通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开放、包容以及对文学作品的精准判断,是“文艺周刊”长久以来能够团结和吸引众多作家和普通业余作者的重要一环。正如宋曙光先生所说:“我们的作者朋友,年老的和年轻的,有名的和无名的,都团结、聚拢在我们周围,为了保证版面质量,需要不断地到他们的家中、单位、宾馆(闭门创作)去约稿……不知不觉间,10年、20年、30年过去了,编者与作者的情谊就是这样结成的。”

还是那句话,3000期,等于3000个星期,等于逾75年孜孜不倦的努力追求,作为“文艺周刊”的读者和作者,我祝愿《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越办越好。

本版题图 张宇尘

2024年9月27日定稿